

经济个人主义的 哲学研究

宫敬才/著



人民出版社

经济个人主义的 哲学研究

宫敬才/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装帧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 / 宫敬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01-016323-9

I. ①经… II. ①宫… III. ①经济学-个人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F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8936号

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

JINGJI GERENZHUYI DE ZHIXUE YANJIU

宫敬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340千字

ISBN 978-7-01-016323-9 定价:5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第二版序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性质

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自己的学科性质问题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该学科奠基人亚当·斯密那里，这本不是问题，经济学是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它与法学和现代意义的伦理学一起构成伦理学学科的整体。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长期讲授这门课程，留传后世的是三部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种情况往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经济学作为专业而自立门户是跨入 20 世纪门槛（1902 年）之后的事情。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脱胎于哲学，与哲学有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是哲学向社会经济生活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亚当·斯密直到 1790 年逝世前始终认为，如此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并没有悖理或不妥的地方，其他人也没有提出异议。

根本性变化发生于 1836 年，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铁杆的资本家代言人西尼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书中说，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其间如果有了错误或是有了疏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极其广泛的恶劣影响；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既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婪，既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既不容许酷爱虚名，投合时好，也不容许标新立异或固执不变，以致使他不敢明白说出他所相信的事实，或是不敢根据这些事实提出在他看来是合理的结论。”^①概括西尼尔的论述，经

① [英]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12 页。

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命题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经济学是科学，作出哲学性结论是逾越学科职责范围之举。这里的“科学”何谓？西尼尔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这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转型的分析便可明了，此处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能，并未过多地思考这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那时，‘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别尊严的做法。其实，投身于这些领域的人，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较具一般性的方面时，他们很乐于选择哲学这个名称，我们甚至不时可以看到‘自然哲学’与‘道德科学’的对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的平等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已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①

哈耶克既切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转型实际又击中要害的分析让人大开眼界，其中的意蕴需要细加品味。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自身学科性质的烦恼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尼尔的“高论”恰好出现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不像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是美国，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是英国。西尼尔发声于

① [英] F.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论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要津——牛津大学，这里是洛克和亚当·斯密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其观点具有的示范意义不能小视。

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自身学科性质问题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挟自身的辉煌成就以自重，在方法论或说哲学意义上肆意向其他学科扩张，哈耶克用政治性词语“专制”表述这一点。这是“科学帝国主义”的第一种形态，严格意义的哲学表现是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登上学术历史舞台。此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发现，在学科性质问题上固守洛克和亚当·斯密开创的社会科学传统远不如靠拢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更有利可图，于是便有了西尼尔所谓经济学是科学的高调宣示。自然科学只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亲”，刻意模仿还是模仿，经济学永远成不了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

第三，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学科性质问题上执意要改换“门庭”的目的何在？哈耶克的说法是要“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说法较为含蓄，实际内容是争夺学术资源，包括社会名望、对自己有利的学术体制以及伴随体制而来的人、财、物，等等。与谁争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争夺上述资源，或许有这个胆量，但肯定没有这样的能力。比较的结果明显可见，它要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争夺学术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学科性质问题上改换“门庭”的做法，实在是学科自私的表现。

第四，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学科性质问题上改换“门庭”的结果如何？哈耶克告诉我们，“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做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①。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哈耶克论

① [英] F.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论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述的意义或许会使科学经济学家火冒三丈，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学科自私的利益考量而改换“门庭”，是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

第五，西尼尔在经济学学科性质问题上纠结还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1836年是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的时期。这一革命的经济成就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任务率先基本完成。与这些成就相伴而行的是社会矛盾深刻、广泛和尖锐，焦点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刻薄以“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为专有名词而被世人诟病，忠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让人不齿。为了挽救这一经济学的不利局面，西尼尔慌不择路地向所谓的科学求救。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就在同一年，为了帮曼彻斯特陷于道德、舆论和法律困境的资本家解围，西尼尔这位不断现身官府又与资本家关系密切的大学教授却以科学经济学家的身份去了一趟曼彻斯特，回来后炮制出名为《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的小册子，试图用他所谓的科学经济学原理说明，曼彻斯特资本家的残酷行径符合科学经济学原理。为了揭露西尼尔假科学真辩护的嘴脸，马克思罕见地在《资本论》第一卷专为他设置了一节：“西尼尔的‘最后一时’”，用以证明西尼尔的所谓科学经济学理论是多么自相矛盾。由这个历史细节可以看出，西尼尔在经济学学科性质问题上的纠结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仍像摆脱不掉的幽灵一样纠缠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中的“独行大侠”熊彼特积十年之功（1941—1950年）写作三大卷的《经济分析史》（未完成），书中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纠结跃然纸上。第一，针对人们对西尼尔的学术水平不以为然的轻蔑态度，熊彼特高调宣称，西尼尔是“那个时期的第一个‘纯粹’理论家”，他在经济分析方面建立了“不朽业迹”，“其成就在李嘉图之上”，而马克思对西尼尔的“严厉攻击”是错误的。第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熊彼特基于经济学是分析科学的基本立场而说重话和狠话，认为必须严格区分分析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哲学只不过是经济学这门“经验科学领域以外的臆想”，学经济学的学生“恨哲学

如同毒药一般”。第三，在一般性层面，熊彼特的观点旗帜鲜明：“即使那些持有明确的哲学观点的经济学家，例如洛克、休谟、魁奈，特别是马克思，事实上在他们从事分析工作时并没有受到这些哲学观点的影响。”^①熊彼特提出和确立自己观点的语境是争辩。与谁争辩？与什么样的观点争辩？他在与经济学家中持有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特定观点的经济学家争辩。这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内在地蕴含哲学性内容是经济学在劫难逃的命运。熊彼特争辩的结果如何？《经济分析史》这部皇皇巨著营造的理论情势似乎表明，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占据上风。

让熊彼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2年后的1962年，他出自同一师门——门格尔——的同胞哈耶克，在获任弗赖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给他的观点几乎是致命一击。哈耶克说：“我在别处说过，并且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使我必须在这里再说一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比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更为真实的一点是，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哪个具体问题能够仅仅靠一门学科作出恰当回答。不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中，而且在人类学、心理学，当然还有历史学中，我们应当了解的全部问题，超出了任何一个人有能力了解的范围。当我们的所有问题触及到哲学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英国这个经济学长期领先的国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而且至少在过去，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这肯定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今天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问题，既表现为经济学问题，也表现为哲学问题。是否有可能存在着独门独户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东西，是大可怀疑的，所有的社会科学肯定都会提出哲学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在更为专业化的学科进行思考之前，已经由哲学家研究了两千多年。”^②哈耶克构筑的语境同样是争辩。争辩对象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沿西尼尔和熊彼特的思路向极

①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卷，第164—166、305页；第3卷，第574、43页；第1卷，第57页。

② 〔英〕F.A. 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端方向发展，即拉大旗作虎皮地挟自然科学的强势以自重，用专有名词概括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样的语境足以让哈耶克的观点确立起来。其一，堵住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退路。这种倾向“视经济学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在经济学的殿堂中，大多数优点都与物理学相同”，因此，经济学是“理论严密的实证科学”。^①这种既违背基本事实又与常识较劲的界定与胡扯无异。哈耶克拨乱反正，认定经济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其二，指认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知识结构关系。没有好的哲学训练和积累，不可能成为杰出经济学家，此为经济学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哲学内在于经济学，没有哲学性内容的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其三，哲学性内容内在于经济学之中的原因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哲学性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经济人的提法和功能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看，哈耶克关于与哲学无关的“独门独户”的经济学不可能存在的判断能够成立。既然哈耶克的观点能够成立，基本事实便被确立下来，熊彼特的观点不能成立。

20世纪末的1998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部新的《经济学原理》教材横空出世，让在半个世纪时间内流行无限的萨缪尔逊《经济学》顿时黯然无光。这部教材的作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星曼昆。该教材的气势着实吓人，开篇不作任何说明和论证便把所谓的“十大经济学原理”砸向学生。检视社会生活的历史性事实便可明了，只有宗教和政治两大领域才有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这说明，该教材所要表达和传播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学术或说主要不是学术。用罗宾逊夫人的话说，它“是神学的分支”，“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②该教材说，“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的方法与物理学家研究物质和生物学家研究生命的方法一样，他们提出理论、收集资料，并分析这些资料以努力证明或否定他们的理论”。“这种研究方法适用于研究一国经济，就像适用于研究地心引力或生物进化一

① [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6、378、365页。

② [英]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2页。

样。”^①回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就能发现，曼昆的话只不过是西尼尔和熊彼特观点的老调重弹，内在逻辑也相对简单：自然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如何从事学术研究，科学经济学家就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因为经济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使然，它适用于研究任何时代和地域的经济生活，具有普遍的科学适用性。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别人就没有理由说三道四，否则，便会冤枉科学经济学。问题在于，真实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曼昆的类比是生拉硬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生物学所具有的关系只不过是哈耶克所说的“表亲”。二者扯不到一起，更不能用“一样”加以描述的关系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用例证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假定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我正在研究电子的衰变。你把我放到一架飞机上，蒙住我的双眼，让我飞往某个地方，再把我和随身的仪器一起降落到地面上。现在，如果我能够，或是如果我就这样选择，我只需要继续我对电子的研究，根本用不着问一句：‘我在什么地方？’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研究劳动市场的经济学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那么，当我带着降落伞下到地面，并打算研究当地的劳动市场时，我真的必须要问一下自己：‘我现在身处什么社会之中？是在非洲部落里吗？这些人是澳洲原住民吗？他们是欧洲人还是日本人？’一位物理学家可能会对他身处日本还是澳洲感到好奇，但他真的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研究结果和他从事研究的方法会因他所处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②罗伯特·索洛设定的思想场景再简单不过，但作为反驳曼昆观点的例证却强劲有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原理要说明欧洲或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其结论或许会沾点边，但说明非洲原始部落或澳洲原住民的劳动力市场，其结果会让人笑掉大牙。原因很简单，那里有劳动力和劳动，但

① [美] 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 页。

② [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67—368 页。

没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是剧烈有时是残酷的社会历史转型的结果，马克思用资本原始积累概括这一转型过程。没有这样的社会历史转型，怎么会有劳动力市场呢？没有劳动力市场，“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曼昆语）的所谓经济学原理，其指称的具体对象在哪里？没有具体指称对象的所谓经济学原理不是形而上学还能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从西尼尔算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自己的学科性质问题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它执意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打扮为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但绝对不是哲学，更不具有哲学性质，结果是屡战屡败。上述三个时间节点（1836年、1941—1950年和1998年）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西尼尔、熊彼特和曼昆）唐·吉珂德式的“战斗”及其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才智之士（上述三位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为什么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是经济学的固有性质无法改变。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镇芝加哥学派叛出逃的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大婶”从另一个极端性的角度定性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它“是文学”，“经济学家是诗人”，“经济学家是小说家”，“写作即表演”，^①这有点过分了。但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性质而是具有哲学性质，离开哲学它就不能成其为自身，肯定符合实际，因为这是经济学的固有性质。我们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人性自私论——为例证说明这一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可用另一名称代替：人性自私论的经济学。其中的理由很简单，没有人性自私论作为逻辑前提，它就失去了自己的内在灵魂。另一个事实同样简单且明显。虽然人性自私论的提法几经变迁，由人性自私论变为经济人，由经济人变为理性经济人，由理性经济人变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但它的直接源头是哲学，本质性内容也是哲学。人性自私论在哲学史中存在了两千多年，走向社会生活的前台，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构建学术大厦的出发点和根基，是近代及其以后

^① 参见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的事情。在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意义上说，人性自私论由 17、18 世纪英、法两国的哲学家提出、论证和确立。亚当·斯密与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关系密切，把哲学意义的人性自私论作为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亚当·斯密如此行为的意图并不复杂。到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相对完整地建立起来，工业革命正蓄势待发。这样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势决定了，已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由于仅在民族国家层面看问题而难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个人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个人与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关系是什么？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和思维方式回答这些十足的哲学性问题，理论结果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后来，相对于亚当·斯密时代而言的社会历史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密的学术后人，上已述及的西尼尔、熊彼特和曼昆只不过是例证，对经济学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甚至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是挖空心思地清除经济学中的哲学根基，人为和强行实际是一厢情愿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执意要把经济学打扮为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且要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硬”。

我们暂且离开西方主流经济学形式高调但外强中干的语境，用哲学的方法检视这一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其自认为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的结果就会显现出来，二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

第一，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那么，它的哲学分析框架就一定是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哲学分析框架中，主观意识反映客观事实，即经济学理论反映经济事实。这种哲学分析框架的硬性要求是，作为反映结果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经济事实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在这样的结果中，不能存在个人倾向性内容，否则，便不是科学。从操作性意义说，结果中的主观倾向性成分越少，科学化程度越高，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行话说是越“硬”，与此相反者则是越“软”，以至于不是科学。

第二，谁在进行反映？当然是经济学家，在我们的语境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科学经济学家。科学经济学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为特定社会职业身份的经济学家。凭常识就可断定，作为人的经济学家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本性，包括自私本性，因为作为逻辑前提的人性自性论是全称判断。罗宾逊夫人在论述这一点时说：“不管怎样，所有的经济学家照样都是人，所以并不能使自己摆脱人的思维习惯。他们的思想体系充满了道德情感。”^①既是全称判断，那么，科学经济学家就不能超脱于这一全称判断的约束之外。

第三，把上述内容结合起来看，经济学是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的认知会把科学经济学家逼入绝境。其一，如果科学经济学家承认自己是人，那么，在反映经济事实时就不能避免自己的自私本性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经济学理论不具有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性质，因为主观倾向性因素已经在劫难逃地渗入作为反映结果的经济学理论之中。其二，如果科学经济学家承认自己不是人，那么，反映经济事实的过程中就不会掺杂主观倾向性因素，作为反映结果的经济学理论确实具有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性质，这样的经济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像物理论和生物学那样的“硬”科学。其三，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科学经济学家面临极其窘迫的两难选择：承认自己是人，就得承认不遗余力且高调倡扬的观点与事实和逻辑不相符合，因而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立场；承认自己不是人？任何神志正常的科学经济学家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到底何去何从？科学经济学家确实遇到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历史和逻辑会说话。它们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十足的哲学性质，所谓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各怀心态的策略性想法而已。

借《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一书再版之际说了如上这许多的话，无非是向读者表明，在一般性意义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是无

① [英]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67 页。

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样的事实向我们昭示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如下事实。首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科学性质的喧嚣声大势强的时候指出其内在的哲学本性，拨乱反正的意义不言自明。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载体要表现于外，要发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这种作用的性质具有好坏参半因而浓烈的辩证性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经济成就与贫富悬殊、资源被耗竭和环境遭破坏的同时并存可为例证。这样的辩证性质启发我们，在哲学层面，用哲学的方法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骨干性范畴的哲学意味，对我们认识当下的社会经济现实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意义。最后，确证西方主流经济学哲学性质的直接好处是，破除美国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科学魔障”，使其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学经历了由群雄逐鹿演变为一家独大的过程。此处的一家是美国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这一经济学所说教的对象是中国的学者、官员、学生和一般大众，使用的语言和语言包裹的内容则是地道的美国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请看如下例证。例证一。张五常说，“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没有两样……要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完全一样”。例证二。陈志武说，“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学、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①把上述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话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说过的话加以对照便可发现，思想内容没有任何变化，变化的只是说话的舌头，美国经济学家的舌头变成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舌头。差别还是有的，美国经济学家不便于自吹自擂说出的话，中国经济学家替美国经济学家说。根据基本事实得出如下结论不能被认为是唐突之举。美国化的中国经济学家说得热闹但内容是拾人余唾，真实的意识形态本质则是被掩藏于后。把掩藏于后的东西挑明了，它是以资本为导向和判定标准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践行者是华尔街的“金

① 王小卫、宋澄宇主编：《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47页。

融天才”们，他们自己发了大财，却让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遭殃。2008年及以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便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现实注脚。面对这样的经济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科学经济学家和中国的学舌者还有什么话要说？

最后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本书初版于2004年，现由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二版在内容上没有大的改动，只是在技术层面做了两项工作。其一，把第一版中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引文出处由1995年前的旧版改为1995年后的新版；其二，把第一版中不妥的字词和句子改正过来。

在此，我诚挚地向本书第二版的责任编辑钟金铃博士深表谢意，他认真的编辑态度和高超的编辑技巧令人感佩。

自序 哲学研究的边界及其突破

在人类自觉意识的初始阶段，哲学从神话中脱胎而出，成为后来一切具体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伴随具体学科如物理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的相继自立门户，哲学逐渐显露出纯化的性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纯化的结果是只留下“逻辑和辩证法”。这种概括与哲学的具体存在稍有出入，因为后者由五个部分组成：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苏联哲学教学体系的长期规束下形成的看法是，纯哲学一旦定型便成为哲学研究的基本边界，治哲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志趣、学识和知识背景专攻一路，造成的局面是，偏重一个分支的哲学知识越来越精细专深，哲学思想家越来越少，哲学知识专门家越来越多。

哲学及其研究的这种局面既无益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功能的发挥，因为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边界只是相对于特定时代和人类特定的认识水平而言，哲学之所以有不断发展的历史，就在于边界的一再被突破。以笔者之见，通过突破边界的形式构筑哲学历史和推动哲学发展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限于哲学的范围之内。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特定方式的哲学模式定型之后，基本的问题就那么多，这就是哲学研究者既可视之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又可作为大有用武之地的边界。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家既不是在老哲学问题上添加新问题，也不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老问题，而是根据时代需要和个人志趣，提出观察老问题的新角度，思考老问题的新方法，解析老问题的新途径。边界的突破在于“三新”的出现，哲

学的历史因此而形成，哲学的发展因此而实现。这是哲学发展的内部史。

第二种方式展现于哲学的范围之外。哲学的本性使然，它不会仅局限于自身以表示存在的价值，更常见者是它要超越于自身之外，向从自身分化出去的具体学科渗透，以渗透的形式发挥影响，以影响的效果表示自己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存在恰是哲学功能和作用发挥的本然状态。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用具体学科以直接形式反映出来的客观现实印证和检验哲学，使哲学明了自己立论的正确或错误，作用的巨大或微小。二是通过具体学科的中介与客观现实发生联系，在联系中提出理解哲学问题的新角度，发现思考哲学问题的新方法，找到解决哲学问题的新途径。由此看来，正是在哲学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哲学的历史得以延续，哲学发展变为现实。这是哲学发展的外部史。

第三种方式是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相对学院化的思路而言，不是囿于纯哲学的圈子内讨生活，而是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哲学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既有哲学边界的突破。这种突破非同小可，从一个角度看，这是离哲学而去的不务正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研究和延续哲学的固有途径之一，因为它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一是它使哲学的应用由自发变为自觉。不管具体学科自以为离哲学有多远，自己声言与哲学如何不搭界，实际情况是，哲学是它的母胎，它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在立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逻辑等方面，没有哲学的介入，具体学科就无能为力。通过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上述诸方面就会由自发变为自觉，自觉的结果是对具体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具体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有了更坚实的哲学基础，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二是延伸和深化纯哲学问题。哲学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以具体学科为中介，从这个角度看，具体学科离客观现实的距离更近。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哲学向客观现实靠近。这样，在由客观现实逐渐向纯哲学提升的同时，哲学也在向具体化的方向迈进。这一迈进过程正好延伸和深化了纯哲学问题。例如，西方哲学中的人性自私论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变为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在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前提的过程